

中医“补偏救弊”与“致中和”哲学思想及“圆道”运动观

马 杰¹ 徐 燕² 严 骅² 尚 力¹ 姚洁敏¹ 严世芸^{1*}

(1.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 201203; 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基金项目: 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项目(ZYSNXXD-CC-HPGC-JD-003); 严世芸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各家学说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上海市中医医史文献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S30301)

* 通讯作者: ysy@shutcm.com, (021)51322222

[摘 要] 通过论述“致中和”思想和“圆道”运动观与中国医学史上“补偏救弊”现象的关系, 探讨相关思维模式与文化观念对中医学术发展进程的影响。作为中华文化的基因——“中和”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了中医学理论建构、临床实践与学术发展的各个方面, 而“补偏救弊”正是“致中和”的哲学思想在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集中体现, 它既是对偏颇的纠正, 又是中医药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内互为对立的学说集合的回归。“圆道”则是“中和”的哲学思想在运动观上的体现, 对以“补偏救弊”的方式推动学术发展轨迹有着直接的影响, 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补偏救弊”, 推动了中医学术的螺旋式前进。

[关键词] 补偏救弊; 致中和; 圆道; 学术发展

偏者, 偏差也。弊者, 《说文解字》曰: “败衣”; 《汉书》曰: “道之失也”。“补偏救弊”一词为并列述宾短语, 意为补救偏差漏洞, 纠正缺点错误。相近词义首见于《汉书·董仲舒传》, 云: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 故政有眚而不行, 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1]。通过阐述西汉之前的朝代兴替, 既否定了秦制, 又认识到了周礼的局限性, 进而主张“继治世者其道同, 继乱世者其道变”^[1], “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也”^[1]。在政治领域首次提出了“补偏救弊”的观念, 并影响了之后两千余年中国人在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中进行变革与创新的基本态度和行为方式。

中医的学术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进步紧密相连。纵观中国医学史, 历代医家常以“补偏救弊”的方式, 开展学术争鸣, 成一家之言。例如晋代皇甫谧、唐代孙思邈等对“服石”的抨击, 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朱震亨等对“温燥”的纠正, 明代医家孙一奎、张景岳等对“苦寒”的反思, 清代医家徐大椿、陈修园等对“温补”的批判。从上述几次著名的论争可以看出, 针对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医学理论及实践偏误——时弊, 医家们采取的方法具有以下共性: 根据《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理论, 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 对相应的时弊进行纠正, 最终在发挥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学说。这是一种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线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方法。线性发展模式是在证伪原有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说, 再对新的假说进行

逻辑上的证实; 而“补偏救弊”则是对具体的命题进行纠正与调整, 原有学术体系核心思想及理论架构并不被推翻。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 作为实践的主体, 历代医家为何常选择以“补偏救弊”而非线性发展模式来推动学术发展? 换言之, “补偏救弊”的现象折射出了在中医学术发展的进程中, 哪些哲学思想与文化观念在起着主导作用? 相关命题的解答, 需要从中医学所植根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

1 “致中和”哲学思想与“补偏救弊”

“致中和”为述宾短语, “致”为指向性动词, “中”、“和”二字常同时使用而成并列结构——“中和”。“致中和”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

“中”为象形字, 其产生由来已久, 据甲骨文释解, 意指一面旗帜的中间。西周时期《礼记·投壶》曰: “司射奉中”; 《礼记·中庸》指出: “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论语·尧曰》载有“允执其中”; 《尚书·吕刑》言: “作稽中德”。以上文献中出现的“中”字已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然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 则在《易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阐述。如《易·解·彖曰》曰: “其来复吉, 乃得中也。”《易·解·九二·象曰》曰: “贞吉, 得中道。”《易·夬·九五·象曰》曰: “中行无咎。”《易·未济·九二·象曰》曰: “贞吉, 中以行正也。”《易·晋·六二·象曰》曰: “受兹介福, 以中正也。”《易·蹇·九五·象曰》曰: “大蹇朋来, 以中节也。”《易·巽·九二·象曰》曰: “纷若

之吉,得中也。”《易·损·九二·象曰》曰:“利贞,中以为志也”。凡此种种,指出了“得中”、“得中道”、“中行”、“中节”、“中以为志”的重要性。《易·系辞下》曰:“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更是指出了“中爻”统摄全卦的重要地位与调济对立的积极作用。

“和”就本身而言,其含义最早与音律密切相关。《尚书·舜典》曰:“律和声。”《诗经·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国语·周语下》曰:“乐从和。”《道德经》曰:“音声相和。”《荀子·劝学》曰:“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周易·中孚》“九二爻辞”曰:“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东汉虞翻曰:“震巽同声后相应,故其子和之”。《文心雕龙·声律》明确指出:“异音相从谓之和。”这些典故中的“和”皆取声音相应、节奏和谐之意。随着语言的发展,“和”的含义逐渐由音律向外延伸,逐渐由“相应”向“协调”转变。《礼记·礼运》亦云:“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其注说:“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加以滑甘,是谓六和。”《尚书·多方》中有“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的记载,蔡沈注曰:“心不安静则身不和顺矣,身不安静,则家不和顺矣,言尔惟和哉者。所以勤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后所协于其邑”^[2]。因此,经过一系列的延伸与演化,“和”字的含义逐步定为各个要素成分的协调与和谐,如《易经·乾卦》所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

《礼记·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和者也,天下之达道。”寥寥数语,以情志为例,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中和”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即天地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是宇宙的最高法则。西汉董仲舒曰:“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而所作为有功;虽有不中者,必止之于中,而所作为不失”^[1]。将“中和”看作处理自然与社会问题的最高智慧。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惟有“致中和”,才能保证“天地位焉,万物育矣”的理想状态,因而主张迁善改过,见偏纠之,随时损益。如《易·损·彖》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同时《易·益·彖》又曰:“益,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此处所引的“损”、“益”二卦,最为孔子所重视,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

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3]。此外,稽考《尚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惟精惟一,允执阙中”,同样强调了“执中”与“损益”的关系。

传统人文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渗透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在中医学范畴内,“中和”的哲学思想涵盖了人体与自然、人体各部分与心身三个意义向度的和谐,成为精、气、神生命观的重要内核,并对治疗原则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4]。这种指导思想是对阴阳平衡观的超越,将局部、暂时的各个平衡或不平衡的元素包容其中,在更高的维度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其着眼点在于维持客观世界在空间与时间轴上的动态稳定。“中和”哲学思想在中医学术发展进程中同样有其显著的体现;“致中和”的思想也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架构与临床实践的领域,更与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可视为中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某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出现,尽管其动机和愿望是良好的,但有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因此,医家的“补偏救弊”,实是中以为志,察利害祸福,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而“得中道”的实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争鸣始终存在,医家秉持“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等体现“中和”的哲学思想的理念,对造成时弊的原因展开批评与讨论。

明代医家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论及医家时会说:“张戴人,医亦奇杰也。世人不究其用意,议其治疾,惟事攻击,即明理如丹溪,《格致余论》亦讥其偏。丹溪之说出,益令人畏汗、吐、下三法如虎,并其书置之,不与睫交,……有谓刘守真长于治火,斯言亦未知守真所长也。守真高迈明敏,非泛常可俦,其所治多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怫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意,医而不知此,是无术也。……医家雅议李东垣,善于内伤,而虚怯非其所长,故有补肾不若补脾之语,……余观近世医家,明理学人,宜莫如丹溪,虽倡阳有余阴不足之论,其用意固有所在也。盖以人当承平,酗酒纵欲,以竭其精,精竭则火炽,复以刚剂认为温补,故不旋踵血溢内热骨立而毙,与灯膏竭而复加炷者何异,此阳有余阴不足之论所由着也。后学不察,概守其说,一遇虚怯,开手便以滋阴降火为剂,及末期,卒声哑泄泻以死,则曰丹溪之论具在。不知此不善学丹溪之罪,而于丹溪何尤?”^[5]此后,李中梓

在《医宗必读·四大家论》中又说：“如仲景张机、守真完素、东垣李杲、丹溪朱震享，其所立言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名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发《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读其遗言，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一中，所谓但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者。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6]。孙一奎、李中梓，均以擅长温补而著称，但对金元四大家之学和时弊的关系都有合理而中肯的认识：诸家之说悉宗《黄帝内经》，其论多为补偏救弊而发，不相摭拾，却相发明；至于流弊的横行，应当责之于后世的“不善学者”。这种认识问题的视角，既维护了诸医家的纠偏求“中”的本意，又指出了偏弊的因由。

清代医家张志聪论述医学领域“中庸之道”的一番言论可谓点睛之笔，曰“中者不偏，庸者不易。医者以中庸之道存乎衷，则虚者补，实者泻，寒者温，热者凉，自有一定之至理。若偏于温补，偏于凉泻，是非中非庸矣，……观古今，多有偏心，偏于温补者惟用温补，偏于清凉者惯用清凉，使病患之宜于温补者遇温补则生，宜于凉泻者遇清凉则愈，是病者之饶以就医，非医之因证以治病也，岂可语于不偏不易之至道哉？”^[7]由此可见，“补偏救弊”正是“致中和”的哲学思想在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对偏颇的纠正，也是发展补充，又是中医药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内互为对立的学说集合的回归。这种回归并不是线形的简单更替，而是在平面、立体甚至时空层面上丰富了对具体命题的理解；多维度的反思与考量，使整个学术体系更为稳固和谐。

2 “圆道”运动观与“补偏救弊”

学术发展的轨迹，归根结底属于哲学领域中运动的范畴。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曾对事物的运动形式作了精妙的概括和论述：“一切被移动事物所进行的运动不外是圆形、直线形或者这种两种形式的混合”。在他看来，宇宙间一切运动形式（包括人类的思维形式）主要由三种方式组成，且由于宇宙是一个球体，因此圆周旋转又是最初的运动，先于直线形或混合式的运动方式，除开圆周移动的旋转运动外，没有一种变化是无限的或连续的^[8]。这样的表述将圆周旋转运动上升到了永恒的地位。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先哲也对这一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易经·说卦传》中提出，“乾

为天，为圆”。以“圆”字概括事物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魏晋时王弼注释道“乾既为天，天动地转，故为圆也”，以“天动地转”定义“圆”，与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观中对圆周旋转运动地位的认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相似的观点《周易》中多有体现，如《周易·泰》“九三爻”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周易·复》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这些论述都体现出了循环往复、如圆无端的运动方式。这种运动规律，乃是通过不断变迁而处于相对适宜的地步。《系辞·下传》中如此总结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唯变所适”。

道家创始人李耳的运动观在其著作《道德经》中也多有提及。《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第四十章》曰：“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五十八章》又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释了道的基本运动形式——“周行”。作为李耳的后继者——庄周，在《逍遥游》中以“抟扶摇而上”描述大鹏如龙卷风一般旋转上升的飞翔方式，以此来借喻自下而上、由小到大、从有限到无限的运动形式。

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撰杂家著作《吕氏春秋》，糅合了众家对于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的论述，其中的《圆道》^[9]篇发挥了《周易》的圆道理论，明确提出了“天道圆，地道方”的运动观，将圆道置于形而上的天道地位，超越于形而下的具体事物；前者为主，后者为臣，上下分明；只有恪守“方圆不易”的原则，才能达到“其国乃昌”的理想状态。圆道之所以为天道，是因为“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运动形式，其中包括了局部对立与整体圆融自合的双重属性。这个概念显然比“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的“地道方”更有普适性与概括性。举例说明，代表天体运行的“月躔二十八宿”，代表昼夜更替的“日夜一周”以及“精行四时”，物质萌生、成长、衰败、收藏的规律，都可以用圆道来解释。其运动特点为“无所稽留”，“冬夏不辍”，“日夜不休”，“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

从《周易》到《道德经》《庄子》，再到《吕氏春秋》，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对宇宙万事万物运动规律的把握

逐渐达成了共识,并且表述清晰,最终以“圆道”为名,以概括这种生生不息的圆周运动。从微观角度分析,极限微小单位的线性运动是构成整体圆运动的基础,推进极限微小单位的线性运动的动力则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从宏观角度思考,圆道运动周而复始,起点逐渐成为终点,终点又变为起点;同理原因会逐渐成为结果,而结果又会变为原因,归根到底是因果互为。这样的逻辑关系促使人们较早发现并研究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相互作用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最后依据,与现代非线性科学哲学中提出的反馈因果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因此,圆道运动中又包含着类似于“负反馈调节”的机制,促使整体达成稳态。再加上时间维度进行考量,周行不息的圆道运动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与循环,而是一种“抟扶摇而上”的螺旋式前进方式。起点与终点的互换,原因与结果的互为,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已经赋予了新的涵义。因此,在圆道运动观的视野中,值得重视的是《老子》的阴阳学说和万物生成观,实是与“圆道观”有共通之处的。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两者由冲而和,产生新的事物。如是世间万事万物生生不息,不断从一个循环进入另一个循环,永远有旧的事物离去,永远有新的事物产生,这也是“圆道”的规律。

圆道运动观对中医学理论架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除阴阳之外,四时递更、五行生克、五运终始、精气上下、气血周流、经络循行等,无不与之紧密相关。乃至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上同样也符合圆道运动的规律,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具有类似于负反馈调节机制特点的“补偏救弊”。在传统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新兴的学说都可以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中找出理论渊源,而鲜有离经叛道。当某种影响力较大的观点在指导实践时出现偏误时,最直接的办法则是据典籍理论进行批驳,通过纠偏,发挥前人观点而成一家之言。其间新说与时弊是矛盾的双方,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着转化。而“补救”既是促使矛盾双方转化的催化剂,亦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更是维持传统学术体系核心思想及理论架构的“稳定器”。一次次“补偏救弊”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推动了中医学术的螺旋式前进,这正是圆道运动规律在中医学术发展轨迹中的体现。

正因此,人们倾向于在不打破系统的前提下从内部寻找原因与解决之道。从而不难理解为何在圆道运动观的指导下,一方面承认新事物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又坚守万变不离其宗。因此,尽管“补偏救弊”使中医在具体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取得一定的进步,原有的学术体系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稳固与强化,但却使得超越体系之外的创新与发展变得更加困难。

3 结语

回顾历史,新说一时弊—补救—新说,似乎成了中医学术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周期律,即时弊的泛滥催生了新兴的学说,新说的诞生令积弊为之一扫,而后世的曲解又使往日的新说成为当时之时弊。在这个历史周期律背后,折射出了更为深层次的哲学思想与文化观念所起的内在主导作用:作为中华文化的基因——“中和”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了中医学理论建构、临床实践与学术发展的各个方面,而“补偏救弊”正是“致中和”指导思想推动学术发展的具体表现;“圆道”则是“中和”的哲学思想在运动观上的体现,对以“补偏救弊”的方式推动学术发展轨迹有着直接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许嘉璐. 安平秋. 二十四史全译·汉书·董仲舒[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205-1206.
- [2]蔡沈. 书集传[M]. 钱宗武,钱忠弼注.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49.
- [3]刘安. 淮南子·人间训[M]. 顾迁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9:269.
- [4]陈丽云,严世芸. “和”的追求:传统哲学视域中的中医学理[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3(2):29-36.
- [5]韩学杰. 孙一奎医学全书·医旨绪余·张刘李朱滑六名师小传[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376.
- [6]包来发. 李中梓医学全书·医宗必读·四大家论[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314.
- [7]张志聪. 侣山堂类辨·中庸之道[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9.
- [8]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M]. 2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9]吕不韦. 吕氏春秋·季春纪·圆道[M]. 吴茹芝译注.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26.

(收稿日期:2013-03-08;修回日期:2013-03-14)

[编辑:黄健]